

# 孫中山張作霖聯盟補充研究

## ——以伍朝樞兩次赴奉為中心

張金超

**[提要]** 聯合皖系段祺瑞、奉系張作霖共同對付直系，是孫中山晚年對內採取的重要策略之一。而派出代表互訪，俾以傳達信息，瞭解對方情況，則為三方聯合的主要手段。伍朝樞作為信使，於1922年3月和1924年3月兩度受孫中山之命赴瀋陽，既向奉方表明了南方政府的立場，又瞭解了奉方所秉持的內外策略，均達到了出訪目的，並引起了社會輿論的關注，對孫中山領導下的南方政府制定對內對外政策產生了一定影響。

**[關鍵詞]** 孫中山 張作霖 聯盟 伍朝樞

**[中圖分類號]** K26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6) 04 - 0191 - 07

1920年直皖戰爭後，直系試圖統一中國，與粵、皖、奉矛盾加劇，為對付共同的敵人，粵、皖、奉醞釀三角聯盟。利用北洋軍閥之間的矛盾，聯合皖系、奉系夾擊直系，是孫中山其時對內採取的重要策略之一。自1922年春季起，三角聯盟日益公開化。其間，各方派出代表穿梭於廣州、天津、瀋陽之間，是聯合的主要手段。孫中山先後派往瀋陽的代表有程潛、寧武、孫科、伍朝樞、汪精衛、葉恭綽等，張作霖派出的代表有李夢庚、韓麟春、李香齋、沈鴻烈、楊大實等。<sup>①</sup>

為尋求與張作霖結盟，孫中山分別在1922年3月和1924年3月兩次委派伍朝樞赴奉。南方政府政治昌明，人才濟濟，孫中山為什麼卻選擇伍朝樞，原因有三：其一，伍民初在袁世凱政府任國會眾議院議員、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政事堂參議，任黎元洪政府國務院參議、外交部參事等職，北京政府的工作經歷，加上其父伍廷芳曾在北京政府擔任外交總長及代理國務總理，使其在北方擁有較為廣泛的人脈資源，便於前往行事；其二，伍朝樞出身名門，曾留學海外，研習法律，以自身的能力而深得孫中山的器重和信任，民初剛登上政治舞臺時，伍因其才幹，被時人譽為“國民黨員翹楚之一也”<sup>②</sup>，自1917年南下追隨孫中山護法以後，孫多次稱讚伍朝樞廉潔奉公、辦事認真。<sup>③</sup>其三，外傳張作霖採取聯日政策，與蘇俄時有摩擦，伍朝樞兩次赴奉時分別任外交部次長和外交部長，北上打探奉系與日本、蘇俄的關係如何，則是分內之事。伍兩次赴奉的背景、過程、社會輿論的關注及所達的效果，則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 一、伍朝樞首次赴奉

伍朝樞首次赴奉在 1922 年 3 月。先是，孫中山派寧武等赴天津，商談合作事宜。後張作霖派旅長李夢庚（字少白）南下。李氏 2 月 12 日在桂林晉謁孫中山，“中山先生問了東北情況後，著重講述了建設新中國的計劃和開發北方港口的計劃。李非常驚奇，表示五體投地的敬佩，因為他從來就沒聽說過有什麼建國計劃呵！”後來，“中山先生即電上海伍朝樞代表他去東北報聘，同時在交我們帶給張作霖的覆信中，也提出聯合討直問題”。<sup>④</sup>

對於伍朝樞此次赴奉，在南方政府來說，屬於秘密從事，因此留下的檔案記錄不多。但從時人的有關記載和其時的新聞報導中，還是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首先，伍朝樞赴奉之事不假。因為張作霖對稍後到奉天的寧武說：“伍朝樞這個年青人，還實在，肯說老實話。他告訴我，兩廣遍地是匪，孫文沒有力量北伐，至少幾個月內辦不到。”張作霖聽信了安福系的造謠，說李夢庚在桂林說代表張帥，擁護孫文做大總統，張見到李就把他大罵一通。經寧武解釋後，“他才恍然大悟，連連點頭說：有道理，有道理！”於是寧武又說：“伍朝樞久居上海，兩廣的情形他並不熟悉，現在已經不是那個樣子了。李少白剛從那邊回來，只要問問他就明白了。”<sup>⑤</sup>此外，1922 年 9 月汪精衛作為孫中山的代表使奉，3 日，汪氏在回答日本記者提問時說及：孫中山“當奉直戰前在桂林時，奉天因贊成孫中山氏之主張，曾遣使往還。當時中山派伍朝樞來奉，諸君當記憶之。”<sup>⑥</sup>汪氏的上述講話，亦是伍氏曾有赴奉之行的佐證。

其次，當時執輿論界牛耳的上海《申報》對伍朝樞赴奉之事亦有揭載。據該報披露，“伍朝樞赴奉，報張作霖派代表來粵之聘。其中經過，為南北政局變換一大關鍵，國人極欲聞其事實，記者昨晤伍氏隨帶赴奉人員某君，紀其所談如下”。

會談首先追溯了伍朝樞赴奉的原因。稱張作霖之前派代表李夢庚及溫某來粵，代表張氏表示好意於南方政府，代呈張作霖致孫中山電，談及四點：（1）承認南方政府；（2）由舊國會解決時局；（3）解決總統問題，由南方主持；（4）贊成地方自治，“李夢庚赴桂林謁孫回粵，即請粵派重要人往奉天一行，為兩方實際上之接洽，此伍朝樞所以啣命赴奉也。”

關於伍朝樞在奉天與張作霖的會見，談曰：“伍赴奉天，張作霖待以上賓之禮，第一日由張作霖請讌，各師旅長文武重要官員皆列席，次日由全省文官公讌，再次日由張景惠以下督軍師長軍官公讌，臨行在張作霖巡閱使署餞行，大廳兩旁為各督軍師旅長談話之處，居中小房一間，張作霖與伍朝樞於此密談。”據悉，雙方所談大要為：（1）舊國會恢復議憲，解決國事，南方若何主張，奉天即若何承認；（2）總統問題，由南方辦理，奉天不過問；（3）中國先謀統一，再由統一實行地方自治；（4）關於軍事上之行動，事關秘密，不易得真相，即知之亦未便揭出。伍、張還談及徐世昌、段祺瑞二人，張作霖“鄙棄徐氏不堪。對於段祺瑞，則甚露恭敬之意，曰段總理尚不失為君子。”<sup>⑦</sup>據云，雙方議定：孫中山將於直奉交戰之際，“從湖北出兵策應張作霖”。<sup>⑧</sup>

再者，3 月 16 日，伍朝樞與上海國聞通訊社記者談話，詳述赴奉情形，並對某些問題發表見解。對北行目的，他講道，“因張雨亭上月派代表赴粵、赴桂，故有此行”。對於接洽結果，聲稱暫時不便奉告。而強調說，西南政府聯絡北方勢力的用意，沒有秘密可言，凡贊成護法主張者，“是為吾友，即與之通力合作，以求速達共同之目的。有為我障礙者，則驅除之，俾我國民早日得享承平之幸福，如此而已。故一並非聯甲系倒乙系；二並非分權利，分地盤。”對於是否要使

用武力來解決問題，伍朝樞認為，“妨礙我之主張者，固有腐敗官僚及陰謀政客，亦有跋扈武人，故去此障礙，不能不籌備武力”，但“非萬不得已，當不出此”。對張作霖是否親日，伍予以澄清，指出，“此次往奉，遇英、美官商，皆異口同聲，否認張氏親日之說。張氏亦曾告余，自執政後，並未喪失權利，且有已失之權利，為其恢復者。現在三省政府蓋不欠日人一文之債。”<sup>⑨</sup>

從上述《申報》的報導和伍朝樞的言論可知，伍氏首次赴奉，向奉系表述了南方政府在反直聯奉上的立場，基本上瞭解了奉系當局對南方政府的態度和對外採取的策略，達到了出訪目的。奉方也向伍朝樞代表的南方政府表達了合作的意向。伍南歸後，孫張聯繫愈加密切。張作霖於5月26日致電孫中山，痛斥吳佩孚等直系軍閥的種種不是，稱吳氏“竟怙惡不悛，逞其兇焰，向我開釁。近更盤踞要津，把持政柄，倒行逆施。”東三省人民希望與西南及長江同志各省取一致行動，“擁護法律，扶植自治，剷除強暴，促進統一，伏願天心厭亂，早日觀成，使合法之政府，得以實現。”屆時則自己立馬解甲歸農，“不再與聞國事”。<sup>⑩</sup>6月4日，張作霖等再次致電孫中山，表達了南北一致的心願，稱“奉天、黑龍江、吉林及內外蒙古實行宣佈自治，與西南取一致行動，同伸救國大義，共圖統一良策。諸君為國家盡瘁，數載於茲，作霖等執鞭之來遲，願同舟而共濟。”<sup>⑪</sup>照理說，孫中山在接到上述來函後，應該立即會有覆函，表達南方的立場，以示溝通，但筆者遍查孫中山的各類文集和年譜，均未有所發現，內中緣由，則不得而知。顯然，孫、張同盟在向著好的方向發展。

但遺憾的是，雙方均因軍事事務，致使聯盟之事出現了短暫的挫折。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依孫中山的設想，於此間“先以兵出湖南，與敵戰於長岳，勝則可進據武漢，退亦可與相持於衡陽，依山據險，以戰以守，勝負之數，必不遽決。”在此之際，由張作霖派兵“直指京畿，囊括直豫，敵前後受攻，勢必無倖”。<sup>⑫</sup>奈何時至6月，奉軍戰敗，被迫退守關內。南方政府方面，北伐軍在湖南受阻，孫中山又禍生肘腋，陳炯明部於6月16日發動兵變，炮轟觀音山總統府，孫不得不往避上海。孫、張同盟的合作計劃暫時擱淺。

## 二、伍朝樞二度受命赴奉

暫時遇到挫折的奉粵雙方，並沒有氣餒，仍嘗試繼續合作。1922年9月，張作霖派代表韓麟春到上海面見孫中山，討論雙方合作計劃。同月，汪精衛受孫中山之命，赴奉天會見張作霖。<sup>⑬</sup>9月22日，孫中山致函張學良，重申南北夾擊直系的軍事計劃。<sup>⑭</sup>1923年4月，外傳張作霖將復辟，張特於10日致電孫，稱“此種無意識之謠誣，在稍有常識者見之不值一哂。唯市虎杯蛇，深恐引起一般誤會。作霖素性光明磊落，但知愛護共和，顧念大局。我公夙所深悉，敬祈代為宣佈，轉飭各報更正，無任禱企。”<sup>⑮</sup>12日孫回電，謂張所言“具見矢忠民國，曷勝欽佩。……執事通電明志，國人皆將喜聞此祥和之言，文亦將視力所及，勉為執事剖白之。更愛護共和之初衷，進而為解決大局之盛舉。”<sup>⑯</sup>這說明，此時孫張之間還有著基本的信任。

是年6月，曹錕以賄選謀得北洋政府總統，上任伊始，即倒行逆施，為國人所不齒，國內各方迅即形成反直大聯盟。1924年3月初，廣州媒體稱：“外交部長伍朝樞，奉帥令赴滬公幹，或將在滬稍為逗留，即轉往奉天，與張作霖晤商大計，聞伍部長已於昨夕趁輪往滬矣。”<sup>⑰</sup>

北京《晨報》緊接著追蹤伍朝樞的行程，稱伍此行“與孫段奉張之三角同盟頗有關係，一般人頗為注意。”<sup>⑱</sup>《申報》3月11日、12日連續披載伍朝樞抵滬的消息。<sup>⑲</sup>13日稱“伍氏自前日午前到滬後，休息一日，於昨日下午搭乘開往大連之神丸赴奉。”<sup>⑳</sup>《盛京時報》載3月11日上

海專電，稱“伍朝樞、汪兆銘兩氏今早來滬。伍氏旋即北上，即前往天津及奉天。關於該氏此行，外間或傳係欲使近漸行疏隔之孫段張三角關係益趨鞏固，或傳聞係協議廣東財政問題等。”<sup>①</sup>

伍朝樞赴奉，名義為張作霖祝五十大壽，實際上孫中山吩咐有任務在身。有媒體懸測：“伍氏要務，表面上謂為鞏固孫張段三角同盟……然其實際，則在懇請援助廣東政府財政之困窮。”<sup>②</sup>“其目的在觀察張作霖對直態度及對三角同盟之真意，懇請三百萬元之貸款，勸告與俄國代表，速開東三省部局會議等”，伍的即將行程是，“定於一二日內赴哈爾濱，約勾留一星期，考察俄國現狀，然後仍由奉天歸粵。”<sup>③</sup>據媒體披露的信息可知，伍此行託祝壽為名，實際上兼負著內外任務。

奉天方面對伍朝樞等人接待優渥。接待伍朝樞的何柱國對伍氏在瀋陽的活動記述甚詳。何柱國（1897~1985），廣西容縣人，早年畢業於廣東陸軍小學堂和武昌陸軍中學。1917年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後被選送日本留學。次年回國，1922年投奔張作霖，深受張的器重。因為何會說粵語，即由其陪伍見客，參觀兵工廠、航空隊和講武堂等，“我從伍朝樞參觀各種軍事機構的認真細緻和不厭其詳地詢問起有關軍事的各項詳情看來，估計他此來除進一步聯繫有關討伐曹、吳的具體步驟之外，還負有考察奉軍的實力，要向孫中山彙報奉軍到底有多麼大的戰鬥力和多麼大的把握等重要使命。因此我在接待中，總是有意識地盡可能讓他多看、多知道一些足以顯示奉軍實力的東西。”以主義建軍，是孫中山晚年建軍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他曾強調：“觀前此革命先烈，前僕後起，視死如歸，即為主義而犧牲也。主義維何？三民主義是也。”<sup>④</sup>“軍隊的靈魂是主義。有主義的軍隊，是人民和國家的保障。”<sup>⑤</sup>對此，伍朝樞問到：“你們奉軍的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義？”何柱國據實回答：“我們奉軍官兵只有少帥等極少數的人知道一些三民主義，信仰二字是談不到的。”伍繼續追問：“官兵不知道為什麼去死，怎麼會打仗呢？”何解釋說，“奉軍講的是愛國，有的是義氣，只要人人愛國，大家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也就能打仗，並且舉了一些不相干的事例”。伍朝樞聽了上述解釋，緊皺眉頭，不發一語，“我看得出他對我的回答是很失望的。”<sup>⑥</sup>對於此點，想必伍回廣州後即會反饋給孫中山。

伍在奉行程緊湊，《申報》對之再予揭載，“效（十九）邀觀航空處兵工廠，號（二十）閱二六旅內外勤，箇（二十一）晨遊皇陵，下午至總部談話，晚偕朱慶瀾赴哈觀察，對中俄交涉有關，准徑（二十五）回奉，晚赴大連，宥（二十六）午乘神丸返滬。”<sup>⑦</sup>抵達哈爾濱後，伍朝樞受到黑龍江都督朱慶瀾等人的熱情款待，並發表演講，主要圍繞兩個問題展開，一痛罵陳炯明，一說國民黨“一大”召開後廣東的情形。<sup>⑧</sup>

伍朝樞返滬後，《盛京時報》才報導了伍氏在奉所聲明西南政府對於時局的主張，稱“西南政府決定實行革命以來，以除軍閥禍國之苗；西南政府尊重民權，不採中央集權制，以便實行主義；西南政府不採聯治結合各省，但各省因促成南北統一加入合作，若不違背民生主義，無論是否自治之省，西南政府自當一律歡迎，不分地界及派系；西南政府一俟內部平定，即大舉北伐，以定國是；西南政府決不借用外債，以重國民負擔；西南政府對於外交主張平等，反對侵略主義，尊重弱小之民族。”<sup>⑨</sup>從上揭內容可知，伍向奉方明確表達了南方政府所秉持的內、外政策。伍朝樞向孫中山報告大要為：“張作霖對北京政府之態度即足證明其對廣東之聯盟所抱誠意。奉直和議問題發生當時，張作霖採取嚴拒態度。惟因廣東局面尚未安定，竟不能進而盡力於聯盟而已。現似直派如不出以攻擊的態度，未始有自開戰端之意志。”“中俄交涉發生，彼連電加拉罕，聲明關於東蒙問題，非移東省直接談判，概無效力，吳佩孚電促簽字，實假手於俄，牽制東省實

力。”<sup>⑩</sup>上述話語，既揭示了奉方對聯盟的態度，又說明了張作霖在中俄問題上的立場。

伍朝樞於29日上午10時搭“和神丸”抵滬，據報載：“南方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偕同次長郭泰祺，代表分赴津瀋，刻已公畢，昨日滬上伍宅接電，知其准於今日上午九時，乘船到滬。”<sup>⑪</sup>抵滬後伍氏發表談話，談及赴奉目的，引起各方注意，各大報紙競相轉載。伍朝樞講道，“余此行純為代表中山先生祝壽，外傳進行三角同盟及借款之說，俱非事實。乃蒞奉後，彼等以奉天情形語予，余亦以廣東情形相告。然此乃私人間之談話，絕無重大意義。祝壽事畢，余以哈爾濱未曾到過，且際此中俄交涉緊迫之時，故轉道赴彼一遊。”伍盡力對赴奉聯盟之事予以迴避，可能有著不得已的苦衷，以免起社會各界不必要的猜測。緊接著，他對中東路問題發表看法，“觀察東路狀況，大致東路俄人與華人各佔一部分勢力，惟俱屬暫局，蓋一過渡時之情形也。至奉天方面，對中俄交涉，於協定草案，早已表示不滿。因草案中關於東路一點，頗有為奉當道所不慊者。奉天派赴北京之數人，外間每稱之為交涉代表，此種觀察，意味過重。蓋特張雨亭氏派往探聽交涉情形者耳。後北京方面，參以私事，致交涉決裂”。伍朝樞謙稱，對此問題，並沒有具體研究，不欲作任何表示，“但確知北京交涉之破裂，非中俄間之關係，實為內部之爭執。不僅為兩黨派間私利之爭，且為個人與個人之爭。此益不足言外交也。”<sup>⑫</sup>此處，對於奉系在中俄問題上的立場，伍朝樞向外界盡力給予辯白。

4月10日報紙又揭示伍朝樞致孫中山密電：“樞自到奉以來，默察雨亭對待北廷之態度，實足以證明其聯盟之誠意，與希望粵局關切。按當時奉直和議發生，雙方信使往返，雨亭確持嚴格對待。嗣以我粵局未定，實力未充，對於聯盟無互助之能力。而奉省與洛吳同處勢力平均之下，重以曹錕既得大位，曹吳聯合，自覺其在東三省之勢力有所不敵。近為時勢所迫，不得不表示聯絡，以解息猜嫌。……極盼我當局戰事早日結束，以共同實行北伐，使彼得有報復之時機。雨亭願極端負提攜之責任。統是以觀，其對於聯盟團結之宗旨及其精神，固終始貫徹而不渝。是亦足以慰藉我帥座聯合之初衷也。”<sup>⑬</sup>此電發表後，外間盛傳南方政府將派伍朝樞赴俄，並撥有旅費。但實際上，伍並沒有發出這樣的信件，他對此予以否認，謂：“彼本人到滬後，並無此電致粵，惟該電語氣，則與本人頗似，即友好間亦頗多以此為詢。”<sup>⑭</sup>看來，伍朝樞還是基本上認可了此信函的內容。伍朝樞、郭泰祺於4月7日夜乘船離滬返粵，對外界宣稱，當俟面謁孫中山商議後即行發表粵方對俄之態度。<sup>⑮</sup>

毋庸諱言，伍朝樞此行，還有另一項重要任務，即打探奉方對蘇俄的真正態度，這在新聞媒體的報導中已有所披露，但伍所說與內心所想、所做並非一致。因1924年初，北京政府與蘇俄展開談判，將達成《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如若實行，則直接影響南方政府外交策略的制定。伍朝樞在抵滬後發表的談話中雖有涉及，但多有遮掩，還是從正面去引導。據上海《時事新報》揭載，4月10日伍朝樞星夜抵達廣州，次日清晨面見孫中山，“伍先述奉張正急向蘇俄表熱情，擬與加拉罕代表達夫謙商議中東路、外蒙撤兵、松黑航權及通商諸問題，並且奉張要廣東贊成彼之局部協商。”又提出應對辦法：“局部協商若由奉方先接洽，則廣東方面頓形落後，我方宜急起直追。目下宜一面敷衍奉張，一面派人接洽，將奉俄之局部協商，轉變為粵俄之局部協商。”在座有質疑者說，奉張可挾東三省與蘇俄周旋，而以廣東的地位，估計比較困難。伍答道：“自地位言之，奉方自較粵方為重要，然空氣及手腕言之，則粵方當可佔勝利。因北京學生、共產主義者及親俄派多傾向粵政府，利用其輿論及運動敦請加拉罕南下交涉，不難達到目的。”伍還提出，“鮑羅廷在俄之勢力不亞於加拉罕，故通過鮑氏在京極力斡旋，可望辦成粵俄交涉。”“此為廣

東政府之新生命，及關係將來之國際地位，不可不急起直追也。”伍的言論，“滿座皆以為然，孫文尤為首肯，當即囑伍朝樞起草，一為廣東政府對中俄交涉之宣言，一為敦請加拉罕南下考察革命政府所根據之民眾勢力，其措詞極為巧妙。”<sup>⑥</sup>

伍朝樞第二次赴奉，名義是代孫中山為張作霖祝壽，實際上，一方面考察了奉軍整軍經武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探及奉方的對外真實態度，對於以後孫中山領導下的南方政府所採取的對內、對外策略產生了實際影響。對內方面，1924年9月江浙戰爭爆發後，孫、張雙方即按照事先協議，分別起兵討伐直系；對外方面，南方政府則完全倒向了蘇俄，親俄的步幅越來越大。

## 結 語

誠如有學者所言，“孫中山晚年在聯合張作霖反直方面下了許多工夫。孫、張關係密切，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諸方面。孫之聯張，不僅僅是為了反對直系，分化敵壘，爭取援助的外交手段，而且還包含了孫中山試圖與張作霖這樣的地方實力派進行軍事政治合作以統一中國的努力”。<sup>⑦</sup>但孫、張同盟是在反直的基礎上結成的鬆散的、暫時的、有條件的軍事聯盟，“大家都抱有互相利用的動機，在政治方面並未找到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所以，取得的直接效果十分有限。”<sup>⑧</sup>伍朝樞兩次受孫中山之命赴奉，既向奉方表達了南方政府的內外立場，又打探了對方所奉行的內外策略，基本上達到了一個“信使”應該起到的作用。

實際上，孫張在尋求聯盟時，並非親密無間。早在1921年孫中山與共產國際代表達林談話時就表示：“我一打敗吳佩孚，就該輪到張作霖了”。<sup>⑨</sup>張作霖一方面與孫中山派出的代表廣泛接觸，一方面又對孫派往奉天的國民會議的宣傳員予以防範。1924年12月，張致函奉天省長王永江，稱“中山方與我聯繫，未便顯然拒絕，至令解望。該黨人到後，可優為招待。一面令各法團每處推舉一二人，約日設筵公宴，即請其於筵間演說，至其他學校或露天演說，則設法婉拒”。<sup>⑩</sup>該函的旨趣，可謂孫張關係的一個縮影——既緊密聯絡，又互相提防。孫中山晚年實行聯俄、聯共政策，引起張作霖的擔心，導致孫張之間出現裂痕，雙方漸行漸遠。以致1924年底孫張在天津會見時，張態度比較冷淡。<sup>⑪</sup>儘管如此，在孫中山病逝後，張作霖仍發出唁電，稱“孫一代偉人，手造民國，今以國事焦勞，沉疴不起，中外有識，同聲一痛。”同時憶及二人在天津見面時的場景，“同寓津邸，握手言歡，感情至洽，人天頓隔，惆悵何如”。<sup>⑫</sup>字裡行間，無不透露出惋惜之情。

---

①關於孫中山張作霖同盟關係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吳相湘的《國父與張作霖》，載朱傳譽主編《張作霖傳記資料》（1），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邱捷的《孫中山晚年與皖奉軍閥的合作和鬥爭》，中山大學學報論叢《孫中山研究論叢》，第1集，1983年；習五一的《孫中山與奉系軍閥》，北京：《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劉貴福的《孫中山與張作霖》，瀋陽：《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3期；邱捷的《孫中山張作霖的關係與〈孫文越飛宣言〉》，北京：《歷史研究》，1997年第2期；馬德銘的《孫中山、張作霖同盟與莫斯科

的關係》，載陳絳主編：《近代中國》，第17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劉貴福：《論孫中山與張作霖聯合反對直系的軍政及外交合作——以汪精衛北上為中心》，載郭春修主編：《張氏父子與東北軍事近代化》，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4年，等等。

②《西報之各派勢力消長譚》，上海：《申報》，1914年6月3日。

③《大總統贊許伍朝樞》，新加坡：《新國民日報》，1921年6月24日；《大元帥指令第904號》，《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公報》，第23號（1924年8月23日）。

- ④⑤章伯鋒、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第四卷（1912—1928），武漢：武漢出版社，1990年，第835~837頁。
- ⑥《汪精衛代表之一席談》，瀋陽：《盛京時報》，1922年10月5日。為聯合張作霖，孫中山曾六派汪精衛赴奉天。
- ⑦《補紀伍朝樞赴奉之經過》，上海：《申報》，1922年4月6日。
- ⑧《日本外交文書》（大正11年），第2冊，東京：六一書房，2011年，第297頁。
- ⑨《伍朝樞與國聞社記者之談話》，上海：《申報》，1922年3月17日；《伍朝樞之又一談話》，長沙：《大公報》，1922年3月22日。
- ⑩⑪桑兵主編，谷小水編：《各方致孫中山函電彙編》，第6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271、280頁。
- ⑫⑬⑭⑮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編：《孫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558~559、558、24頁。
- ⑯羅家倫、黃季陸主編：《國父年譜》（增訂本），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第1003~1004頁。
- ⑰⑱⑲郭春修主編：《張作霖書信文電集》（下），瀋陽：萬卷出版公司，2013年，第565、565、606頁。
- ⑳《伍梯雲首途赴滬》，《廣州民國日報》，1924年3月7日。
- ㉑《伍朝樞北來》，北京：《晨報》，1924年3月11日。
- ㉒《南方要人來滬訊》，上海：《申報》，1924年3月11日；《汪精衛伍朝樞昨均抵滬》，上海：《申報》，1924年3月12日。
- ㉓《伍朝樞昨日赴奉》，上海：《申報》，1924年3月13日。
- ㉔《伍朝樞已由申北上》，瀋陽：《盛京時報》，1924年3月13日。
- ㉕《伍朝樞赴奉任務》，北京：《晨報》，1924年3月19日。
- ㉖《伍朝樞將由奉赴哈》，北京：《晨報》，1924年3月24日。
- ㉗楚愴：《孫總裁閱兵記》，上海：《民國日報》，1921年4月5日。
- ㉘杜春和、林斌生等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11~112頁。
- ㉙《國內專電》，上海：《申報》，1924年3月26日。
- ㉚《伍朝樞氏游哈時之談吐》，上海：《民國日報》，1924年3月31日；《中山代表到哈南下》，上海：《申報》，1924年3月31日。
- ㉛《伍梯雲在奉之聲明》，瀋陽：《盛京時報》，1924年3月28日。
- ㉜《伍氏報告中重要點》，瀋陽：《盛京時報》，1924年4月2日；《國內專電》，上海：《申報》，1924年3月31日。
- ㉝《伍朝樞今日到滬》，上海《時報》1924年3月29日；《伍朝樞今日到滬》，上海：《申報》，1924年3月29日。
- ㉞《伍外交部長由奉歸來之談話》，上海：《民國日報》，1924年3月30日；《伍朝樞由奉歸來之談話》，上海：《申報》，1924年3月30日。
- ㉟《伍朝樞電粵之詳志》，瀋陽：《盛京時報》，1924年4月10日；《電報》，上海：《時報》，1924年4月1日。
- ㊱《伍郭今日返粵》，上海：《時報》，1924年4月7日。
- ㊲《伍朝樞返粵》，北京：《晨報》，1924年4月8日；《伍朝樞等由中回粵》，瀋陽：《盛京時報》，1924年4月9日。
- ㊳《廣東對中俄之交涉》，上海：《時事新報》，1924年4月18日。
- ㊴劉貴福：《論孫中山與張作霖聯合反對直系之軍政及外交合作——以汪精衛北上為中心》。
- ㊵劉曼容：《孫中山與中國國民革命》，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7頁。
- ㊶達林：《中國回憶錄（1921~1927）》，侯均初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113頁。
- ㊷《孫中山與張作霖晤談》，《天津河北文史資料》，第9輯，天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河北區委員會文史資料文化藝術委員會，1996年。
- ㊸桑兵主編，劉斌、孫宏雲編：《各方致孫中山函電彙編》，第10卷，第57頁。

作者簡介：張金超，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廣州 510630

[責任編輯 陳志雄]